

美国的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述评

姚苏平

内容提要 美国的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兴于上世纪70年代,历经了学科体系与学术立场的转变,研究者身份认同的变化,并带来了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式的迁移。其研究重点是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全方位、多角度的梳理;对中国题材作品的民族文化比较研究;对儿童文学接受主体的关注;以及中美学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多元化。本文以分析和批判的态度理性对待美国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在互为参照的视域下,尝试扩容、深化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关键词 美国 当代中国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研究

姚苏平,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教师 210036

美国的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兴于上世纪70年代,历经了学科体系与学术立场的转变,研究者身份认同的变化,并带来了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式的迁移。其学科体系从冷战格局中“中国研究”的一个分支,转变为儿童文学专业研究的客体对象之一;其学术立场、方法从专注于对文革中儿童文学作品的政治话语解读,到梳理整个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历程,评析不同文学形式、不同年代作品中“儿童”形象的嬗变,尝试进行民族文化间的比较研究。从上个世纪70年代至今的近五十年间,其研究者也由美国本土学者的一家独大,逐步过渡为华裔学者的渐露锋芒。前者的研究对象和渠道主要是中国官方发布的英文版作品;而后者在中西方互为参照的视域中、在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体系和理论话语中,在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生成与形态的在场考察中,给出了纵深丰富的文化阐释。21世纪以来,美国学者把对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重心还原为对中国儿童读者、儿童阅读接受的关注,更接近于美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与此同时,随着儿童文学全球化语境下的“学术共同体”的深入发展,不断出现中美儿童文学界的对话与合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开拓了更宽广多元的学术空间。

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江苏儿童文学地域特色研究”(项目批准号:14ZWD002)阶段性研究成果,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

一、从“中国研究”到“中国儿童文学研究”

美国对中国尤其是大陆地区的现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关注和研究兴于70年代,是冷战格局下“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或“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的边缘性分支。通过分析、评价、批判同时期中国大陆官方出版的英文版儿童文学作品,解读中国的政治风向,考察中国未来主人翁的样本性和典型性。以美国本土学者Thomas A. Zaniello、Nellvena Duncan Eutsler为代表,对文革期间、拨乱反正期间的儿童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通过意识形态话语方式进行刻意的解读。上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美国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产生新变,从“中国研究”的边缘分支进入到“儿童文学”学科体系中。这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的大背景有关,也缘于其学科体系与学术立场的转变,更与Mary Ann Farquhar、Jane Parish Yang、Margaret Chang、Xu Xu等学者的努力不无关系。

事实上,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儿童文学,美方一直抱有好奇心与解读欲,如Thomas A. Zaniello相继发表了《五个英雄:中国儿童文学一瞥》(*Heroic Quintuplets: A Look at Some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1]、《绽放的鲜花:中国儿童文学的多样性》(*Flowers in Full Bloom: The Variety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2],对整个文革阶段发表的儿童文学作品给予了高度关注。对传统儿童文学的被筛选、当代儿童文学创作主题的“小英雄化”叙事,尤其是“红小兵”的多种样本,做了充满政治意味的解读。《五个英雄:中国儿童文学一瞥》(1974年)以《中国五兄弟》、《金斧子》等传统民间故事为例,比对了在美国的传播版本与中国本土版本的区别,阐述了这一类型的传统儿童文学为何能够被1949年以后的政治文艺形势所接纳,讨论了它们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是怎样被改写和认知的。以《密信》、《椰林中》、《勇敢的小牧人陆超》(音译)、《跟着爷爷打猎》、《小龙》、《今天我值日》等英文版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品为案例,阐述了儿童“小英雄”的榜样性意义。文革期间,文学中儿童形象的“士兵化”现象普遍。《绽放的鲜花:中国儿童文学的多样性》(1978年)分析了《今天我值日》、《暴风雨》、《三件毛衣》、《好孩子》、《小红卫兵》等70年代发表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小红卫兵”的多样性。政治围城中的当代儿童文学,其独特性表现为既与西方儿童文学隔离,也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切割。但是民间故事、通俗文学仍被谨慎而有限度地采纳了。比如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双结合的甄选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被刻记上了彻底的革命精神,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革命话语中被改造的必然命运。尽管Zaniello对当时的中国儿童文学有较多的关注,但是常常处于“失语”的尴尬境地:当他刚刚断言《金竹》体现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出现了“去政治化”的倾向,《中国文学》(英文版)刊登了北京小学生的“群众来信”,以《金竹》为批判对象,并发表了《每一面墙都是战场》的诗歌。儿童自我教育的意识和能力都令Zaniello吃惊和困惑,最终他认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缺少浪漫、幻想气质,其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和目的是为政治任务服务。在西方视域中,当代中国儿童与儿童文学无疑成为一个极具研究性的“他者”。

真正对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进行现场专题研究的是Nellvena Duncan Eutsler。他以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究为主旨,于1979年1月参访了北京、上海、南京、无锡等地的学校、图书馆,通过文献资料搜集与现场考察访问相结合的方式,在美国《儿童文学》期刊上发表论文《东方之旅: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与教学媒介之印象》(*Journey to the East: Impression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Instructional Media in Con-*

[1] Thomas A. Zaniello, *Heroic Quintuplets: A Look at Some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Children's Literature*, 1974(3): 36-42.

[2] Thomas A. Zaniello, *Flowers in Full Bloom: The Variety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Children's Literature*, 1978(7): 181-190.

temporary China)^[1]。与此前的研究方式相比,该论文着眼于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特殊性,更以美方儿童文学为参照,进行了相关类型和价值的比较研究。毫无疑问,西方学者热衷于探寻当代中国历经政治与文化革命后的传统文化的痕迹。Eutsler 随身携带了《三字经》,一到中国就不断询问各地陪同、受访人员有关该书作为中国儿童启蒙读物的使用与传播情况。得到的反应是“放纵大笑”:“《三字经》是孔夫子的东西……孔夫子已经被彻底抛弃了”。Eutsler 试图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进行评估,尽管他提到了儿童最受欢迎的作品《水浒》、有趣的民间故事“刘三姐”、叶圣陶的《稻草人》和若干匿名作者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仅是缘于“被告知”,而不是他自己的兴趣所在;或者说,中国本土所构建的儿童文学知识谱系在 Eutsler 眼中不具有话语权利。颇有趣味的是 Eutsler 与此前的美方学者一样^[2],都认为中国儿童的才智发展超过了相应的年龄段;都把中国传统儿童文学的现代传播落实到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上。这与该题材的传播范围之广、对儿童影响之深有关系,也与多数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品视而不见、格外厚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有重要关联。

纵观 20 世纪 70—80 年代美国本土学者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研究,不管是以传统中国文化为“正朔”,还是以西方视角为依据,其学术立场所构建的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不以“中”为体、不以“西”为用。它无疑是这两方的“他者”,以面目可疑的形象与身份附属在“中国研究”的场域内。尽管美国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延续了美国儿童文学研究对儿童读者的关注,但其学科体系自觉地归属于“中国研究”范畴,并未将儿童文学作品的提供(出版与流通、图书馆馆藏与借阅等)视为文学现象,也未将采访到的儿童阅读感受视为文学接受,而是将上述所有资料进行文化阐释和泛政治化解读,将其视为官方意志的呈现。其研究对象滞留于政治语境中被“塑造”的“儿童”,研究时段盘桓于文革与拨乱反正期间的文化嬗变与儿童文学书写,研究方式呈现是以文化社会学为代表的外部研究形态。对儿童文学作品的体裁、题材、风格、审美品质、精神内蕴等问题几乎视而不见,对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过程性语焉不详,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嬗变也未给予足够的关注。无论是研究内容的广度与深度、研究成果的品质与学术地位,在全美儿童文学研究体系中都较为薄弱。

无论是对中国传统趣味的迷恋,对彼时中国政治文化革命的抵触,还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矜夸,上述美方学者的论断始终未能勾勒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全貌,也无法深入到儿童文学的中国腹地。中国学者的英文论文为西方了解当代中国儿童文学打开了局面,如黄庆云于 1986 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主办的权威儿童文学研究期刊《狮子与独角兽》上发表英文论文《中国儿童文学概观》^[3],对现当代中国儿童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做了介绍,给出了一套迥然于西方学界认知的知识谱系和儿童文学作者:鲁迅、茅盾、叶圣陶、冰心、严文井、张天翼、巴金、郭沫若、陈伯吹、洪汛涛、葛翠琳、叶永烈、郭风、宗璞、金波等。作家、作品的选择与淘汰,本身就彰显了审美取向、价值判断和权力意志,相比于此前西方学界迷恋于传统民间故事的当代传播,作为历史亲历者的黄庆云,扎根本土、放眼世界,对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回归“儿童文学”学科体系,可谓有筌路蓝缕之功。

可以说,与寓居美国的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大陆赴美学者对文学史的“再解读”等对于中国现当代专业建设的启示作用相比,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研究的学科体系与学术立场的转变,是由大陆学者砥砺前行新开始的。1986 年黄庆云发表英文论文《中国儿童文学概观》期间,中国大陆地区逐步开展了对儿童文学作品艺术价值的再评判、对现代儿童文学史的梳理。如蒋凤

[1] Nellvena Duncan Eutsler, *Journey to the East: Impression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Instructional Media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ldren's Literature, 1981(9).

[2] William Kessen, *Childhood in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x, 215.

[3] Huang Qingyun, *A Surve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 The Lion and the Unicorn, 1986(10):23-25.

的《儿童文学概论》(1982)、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室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1987),此后的系列论文、相关专著、高校教科书层出不穷,呈现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整体性和丰富性。可见黄庆云的英文论文既向美方同行宣示了迥然于美式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学科路径,也代表了彼时国内现代儿童文学研究“知识考古”的最新态度、意识和方法。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能够较为顺利地完学科体系与学术立场的过渡,个中原因大致如下:其一,儿童文学专业并非人文社科热点,不像中国现当代文学那样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解读现场。其研究的“滞后性”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成果能够为儿童文学专业更理性地吸收、扬弃。其二,美国的儿童文学研究的“泛文化”方式更关注儿童主体的阅读接受,儿童文学与儿童心理、儿童教育、儿童权益、儿童文化等方面的关系;这一研究模式正应和了大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凡起例的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因此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得到了跨学科、跨领域的多方关注,获得了学理性的多元发展。其三,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在过去三十年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意识形态原则”、“文学自主原则”、“市场化原则”的博弈与共谋,以及文本形式和传播渠道多元化、创作主体的泛化等新变,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也呈现出当下儿童文学全球化的共性特点,使得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有了新的学术领域和“学术共同体”。因此,顺应文革后的政治文化变局,将儿童文学回归“文学”体系,以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学术立场看待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不仅是中国儿童文学近三十年的发展实况,也开启了美国学界将中国儿童文学纳入其“儿童文学专业”研究对象的肇端。

二、研究范式与研究对象的迁移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的美国儿童文学研究,从隶属于“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或“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逐步回归到儿童文学专业(Children's Literature)的研究客体中,其研究方式与研究对象也随之变化。重点表现在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全面、深入、多角度的梳理和评价;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特征的纵向挖掘与横向比较。

1. 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梳理、对不同时段儿童文学发展阶段的关注、对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人物的解析、对1949—1978时段中国儿童文学特殊性的解读,以及相关领域学术成果的探讨和交流。

第一是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整体性梳理、评价与回应。如Nellvena Duncan Eutsler对《中国通俗文学与儿童》一书的评价^[1],即是对中国文化中的儿童文学做了梳理和回应。《中国通俗文学与儿童》的作者施高德夫人(Dorothea Hayward Scott)曾担任香港图书馆协会首任主席,该书由美国图书馆协会出版^[2]。论著列举了中国的各类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话本、戏剧、木偶戏、童谣、谚语、谜语,介绍了龙、凤、摇钱树、门神等中国传统意象。传统文化的高度发达给中国儿童的早期教育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民间故事的模式化也使得它们在几千年的传播中具有超级稳定性;佛教东传带来了更多的口头民间故事类型;象形文字使得中国的书面语和故事文本更具形象性、更利于儿童接受;文本书面化、印刷读物的发达,使得儿童的阅读史广泛、深入、悠久……正是这种不同于欧洲文化环境、口头与书面语言传播状态、宗教信仰的中国传统文化,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继承人。施高德夫人通过对上述问题的阐述和分析,凸显了迥异于西方文化的东方特质。在第七章“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中讨论了西式教育模式的引入、教会学校、五四运动、以林译小说为代表的西方小说的译介、白

[1]Nellvena Duncan Eutsler, *Chinese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Children's Literature*, 1982(10):183-185.

[2]Dorothea Hayward Scott,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and the Child*, Chicago: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0.

话文运动、周氏兄弟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公共出版物、童书(包括刊物、图画书等类型)的出版(如张乐平的“三毛”漫画、丰子恺的作品)……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了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发展的脉络。施高德夫人认为从公元前2世纪到1909年,中国儿童文学在中国式“教化”的理念下,生成了一套稳定的传承体系,其辐射范围和影响时段超过多数其它民族的文明传统。她著书的重要目标就是要让读者理解1950年代以前的中国儿童是如何被“塑造”的(shape);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独特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施高德夫人称之为the Marxist People Republic)时期被抛弃、替换了。施高德夫人颇得中国当代文化形态和生产方式的真味,她对这个“异邦”的稔熟和情感,带来了这项研究的片面性深刻。更有意味的是Eutsler的书评,一改1979年访寻中国儿童文学现场时的傲慢,似乎也从该书中获得启发,较为审慎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文学与儿童间的关系有着深远和复杂的关联,并以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为文章结语。能够正视中国传统文化强大变异性与现代化带来的嬗变,能够以学理性的立场讨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状,预示着美国相关学界的学术立场的转变和研究范式的迁移。

从1986年黄庆云首次在美国权威儿童文学研究期刊《狮子与独角兽》上发表《中国儿童文学综述》以来,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谱系不仅得到刷新式梳理,而且真正进入到儿童文学专业的学科体系中,成为儿童文学全球化语境中的研究对象之一。当然,黄庆云这篇4页的英文论文仅是简述了现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作家作品概况,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与特征未能作出全面而有深度的阐述,直到《中国儿童文学:从鲁迅到毛泽东》(*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 From Lu Xun to Mao Zedong*)^[1]的出现。作者Mary Ann Farquhar对中国1920—1980年间的儿童文学发展史做了充分的说明。在这本著作中,传统文化背景、五四运动的影响、鲁迅与周作人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叶圣陶与冰心的作品特质、战争期间的儿童文学作品、1949年以后的中国卡通作品、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后毛泽东时代的儿童文学发展等均得到了详略得当的介绍和分析,勾勒出清晰明确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脉络,以跨语际实践的方式让英文世界体察到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转变与革命化叙事的生成性与权宜性的逻辑关系,可谓是海外同仁研究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入门基准(Canon)^[2]。

第二是对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重要发展阶段的关注,尤其是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特点的深入评析。国家民族话语的元叙事给中国儿童文学刷上了一层底色,文学所呈现的“儿童”与国家民族、政治、社会、历史和人的主体性有着重要的关联意义,它的样本性意义不言而喻。Kate Foster的专著《中国文学与儿童: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中的儿童与童年》(*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Child: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3]再一次关注了中国“儿童”被成人观念、社会价值、政治意识“殖民”化的后新时期。对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文学做了较为深入的梳理和分析,以23位作家的31本小说作品为样本,分析了80—9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儿童”与五四文学以来的“儿童”的异同,并将这一时段的文学作品的特征放置在中国文学、文化、政治、社会历史的嬗变大背景中,强调了这一时期西方文化与文学对中国小说创作、文学批评、文化思潮的影响。在中西方对儿童的“想象”语境中探讨了纯真童年、父母与儿童关系、向内聚焦的儿童视角的叙事模式等问题。该书后半

[1] Mary Ann Farquhar,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 From Lu Xun to Mao Zedong*, New York, London: M.E.Sharpe, Inc, 1999.

[2] Henrietta Harrison, *Reviewed Work: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 From Lu Xun to Mao Zedong* by Mary Ann Farquhar, *The China Journal*, Jul., 2000(44):164—166.

[3] Kate Foste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hild: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部分论述了80-90年代中国小说中繁杂多样的叙事策略。性别、阶层、民族等构建的社会身份,“独生子女”政策等系列社会现状所带来的生理和心理的焦虑。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出版后不久,来自美国中央密歇根大学的Xu Xu和香港大学的杜艳(Daisy Yan Du)分别发表了书评^[1]。Xu Xu认为Foster对中国当代小说中“儿童”的被压抑、被腐蚀、被抛弃的叙事模式是上世纪80-90年代畸形化(malformed)的中国文化的“信号物”(signifier)。杜艳认为该书能够将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与儿童想象构成互文关系,对中国小说中的“儿童”与“中国童年”的解读颇有说服力,并填补了西方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空白。可以说,两位华人学者Xu Xu和杜艳对此书的回应,显现出相关学术问题国际交流空间的开阔自如,呈蝴蝶效应般营造着场域中的身份意识和学术对话。

第三是对历史细节的挖掘。主要着眼在两个端点上:一是对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过程的关注,二是对1949-1978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具体解读。前者的研究基本是在本土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阐释。如评析杜威、鲁迅等重要人物对中国现代儿童观的影响、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作用。后者的研究主要是在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中,从“理论”和“思想”角度进行文化阐释,在“问题意识”的驱动下,通过“新批评”的文本细读,生发出不少研究成果。

对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过程的关注,落实在重要人物对中国现代儿童观、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影响。如Xu Xu的《翻译,融合,现代化:杜威和20世纪早期的中国儿童文学》(*Translation, Hybrid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John Dewey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2]广泛征引了朱自清、方卫平等国内儿童文学学者的观点与论述,提出了对西方学界肯定杜威的全球影响力的质疑,从传统中国文化中的“赤子之心”、“童心说”中挖掘儿童中心论的中国本土资源;从胡适、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对“现代公民”意识的鼓吹,分析五四知识分子援引杜威的儿童中心论的思想出发点与目的;从叶圣陶、丰子恺等人的作品来论证儿童中心论的中国儿童文学表现形式。通过对上述几个方面的探究,考察杜威的儿童中心论在中国的旅行过程,进一步讨论了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五四知识分子在文化殖民、地域传统间选择的过程性和多样性,构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张力。类似的研究方式如Chu Shen的《翻译,儿童文学与鲁迅的知识分子式反抗》(*Translatio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Lu Xun's Intellectual Struggles*)^[3],以清末民初、五四时期、五四以后为三个阶段,以鲁迅的翻译工作和部分作品为样本,在李欧梵、钱理群、Mary Ann Farquhar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鲁迅对于进化论、国家主义、革命等话语的复杂思辨过程。

二是美国学界始终感兴趣于1949-1978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对这一领域有了更丰富深入的“再解读”。上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本土学者,在中西隔绝的情况下,隔海看中国,多凭借中方英文版出版资料对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主题类型、价值评价、审美取向做出冷战格局中的政治解读。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转变,中美关系的变化、交流的增多,专业研究比较意识的加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很快就由“东方奇观”进入到全球化进程的儿童文学学科的知识体系中,回归为当代儿童文学的形态之一。尤其对本土文化有切身体验,又接受了西方完备学术训练的华裔学者迅速成长起

[1] Xu Xu, *Review: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Child: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The Lion and the Unicorn, Volume 38, 2014(3): 404-406. Daisy Yan Du, *Review: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Child: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The China Journal, 2015(73): 249-251.

[2] Xu Xu, *Translation, Hybrid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John Dewey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2013(44): 222-237.

[3] Chu Shen, *Translatio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Lu Xun's Intellectual Struggles*, *Bookbird: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Literature*, Volume 53, 2015(4): 4-11.

来。以Jane Parish Yang、Xu Xu等为代表的华裔学者,在本土文化积淀与美式理论训练的张力中,对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作品与重要文本做出了多元、丰富的阐释。他们在“去帝国”、“去冷战”、“去殖民”的学术方法与理念中,在本土情怀与国际视野的张力之间,以宏观与微观、历史与逻辑、内部与外部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深层次地挖掘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塑造未来民族性格”^[1]的集体无意识,不断修改着对中国儿童文学的阐释机制,并建构出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一种研究模式。如Xu Xu的论文《“毛主席的孩子”:〈闪闪的红星〉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儿童”建构》(*“Chairman Mao's Child”: Sparkling Red Sta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2],以《闪闪的红星》为样本,检讨自新文化运动“发现儿童”以来,“儿童”是怎样被一步步塑造为民族国家话语中的理想化儿童。

Jane Parish Yang论文《家庭的改变: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家庭想象(1949-1993)》(*A Change in the Family: The Image of the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1949-1993*)^[3]考察了中国传统伦理核心价值中的“家国”关系的现代变迁,深入探讨了“家庭”在当代中国文学叙事中的位置和意象,凸显中国儿童被塑造的过程。Yang把当代儿童文学分为四个时段:1949-1966,1966-1976,1976-1985,1985-1993。1949之前曾出现过的自然的、个体的、消极的、动摇的文学叙事迅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下的家庭和儿童,长辈往往是封建的、充满小农思想和私利意识的反面角色,而儿童的纯洁性和革命性几乎是与生俱来的。1966-1976文革时段的儿童文学遭遇了毁灭性的遏制。1970年恢复出版图画书的上海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作品中,儿童没有自身的快乐和童趣,只有为阶级斗争而存在的意义。儿童的先锋性、革命性被无限放大了,文学中的儿童几乎都是小士兵、小英雄,他们与包括家庭在内的所有私属关系做着坚持不懈的斗争,“家庭”消失了。1976-1985中的伤痕文学中,家庭开始回归,甚至有了国家和家庭间的价值冲突。对文革的反思、对其遗害的警惕,也通过“儿童”折射出来(如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而1985年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中,儿童不再是完美的小战士,恰恰相反,独生子女现象造成了无数被宠坏了的儿童,他们任性、自私、懒惰,缺少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在父亲角色淡出儿童文学视野时,母亲变成了家庭生活的核心,而堂表兄弟、伯舅、(外)祖父,以及男性教师、男性官员成为了儿童社会化的引导者。“儿童”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不断变迁的形象构建,反映出时代文化的剧烈变动。

通过上述论文,可以看到美国语境中的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既有了切入点的微观把握,在中国材料和西方理论方法之间驾轻就熟;也有了整体性的宏观认知,形成了客观而完备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二者共同构成了点与面的多维度研究体系。与此同时,随着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成熟与影响力的散播,许多华裔学者对这一时段的中国儿童文学的研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延伸,既强化了西方对这一研究时段的解读欲,又补充了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类型和主题,也进一步维护了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稳定性。

2. 对中国题材、中国文化的关注和比较研究。

在美国的儿童文学领域,对中国素材的关注一直不绝如缕。如著名的纽伯瑞儿童文学奖(Newberry Medal),早在1926年、1933年分别获得金奖的作品《海上的神》(*Shen of the Sea*)、《扬子江上的杨福》(*Young Fu of the Upper Yangze*)都是以中国神话传说、民间生活作为故事背景。华裔作家Laurence

[1]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页。

[2]Xu Xu, “Chairman Mao's Child”: *Sparkling Red Sta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 Volume 36, 2011(4):381-409.

[3]Jane Parish Yang, *A Change in the Family: The Image of the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1949-1993*, *Children's Literature*, 1998(26):86-104.

Yep所创作的充满中国元素的《龙的翅膀》(*Dragonwings*)、《龙门》(*Dragon's Gate*)分别获得1976、1994年的纽伯瑞银奖。2016年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的杨谨伦(Gene Luen Yang),其代表作《美生中国人》(*American-Born Chinese*)将中国民间传说、华裔移民生活和美式漫画融合起来。上述皆为美国儿童文学创作文本中的“中国”素材,但是对中国题材、中国文化的整理与分析工作较为滞后。从笔者搜集的资料来看,较多的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想象多集中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时间段,多以白人的探险故事勾勒出东方古国的神秘、奢靡和没落。Patricia Dooley的论文《瓷器·辫子·宝塔:19-20世纪插图版〈夜莺〉中的中国想象》(*Porcelain, Pigtails, Pagodas: Images of China in 19th and 20th Century Illustrated Editions of "The Nightingale"*)^[1]以安徒生的《夜莺》为切入口,追溯了自《马可·波罗游记》以来欧洲流行的中国风(Chinese Style),《夜莺》构成了对神秘东方浪漫想象和真实中国的双重鸣奏。Dooley考察了1893年伦敦和纽约出版的中国传统民间故事,检索了1861年至今在英国和美国出版的有关《夜莺》的40个版本。无论是水彩插画中的中国元素,还是《夜莺》中的灯塔、冠盖、羽扇等意象,Dooley认为以《夜莺》为代表的西方童话一方面在创造(invented)中国,浪漫化中国想象;另一方面在历史细节中研究中国,并与浪漫想象中的中国形成互文性。类似的研究还有Lorinda B. Cohoon对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的小说《八位堂兄弟》的中国想象,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东方学的解读^[2]。2014年Shih-Wen Chen的专著《英国儿童小说中的中国形象(1851-1911)》(*Representations of China in British Children's Fiction, 1851-1911*)^[3]以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英国18本儿童小说为研究资源,从冒险故事、战争故事中分析英国小说中的“中国想象”。与《夜莺》中的中国形象的浪漫奢靡相比,此时西方儿童文学中的“中国”更为神秘、残暴和懦弱。

Judith V. Jechner《中国民间故事中的儿童想象》(*The Image of the Child in Chinese Folktales*)^[4]通过对“神笔马良”、“中国六兄弟”等中国民间故事不同版本的分析,认为中国“儿童”或以赤子之心成为成人的保护者、救赎者,或以忠贞、牺牲的形象出现在民间故事中。类似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如《中国儿童文学的过去与现在》^[5],对中国传统文学中儿童的“成人化”、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过程、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中的新质(如《皮皮鲁与鲁西西》的出现、以图画书为代表的新文本)等有非常流畅的梳理。另外,中国当代教育重负下的儿童^[6]、1980年以后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武侠”元素^[7]等主题也进入到美国儿童文学研究的视野中。这一类研究既有对中国儿童文学过去与现在的梳理,对当下中国儿童形象的剖析,也有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分析与归纳,着眼于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儿童形象,且在多样文本中进行了分析和归纳。

值得注意的研究还包括对中国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如Lan Dong的专著《中美两国的木兰传说与传

[1] Patricia Dooley, *Porcelain, Pigtails, Pagodas: Images of China in 19th and 20th Century Illustrated Editions of "The Nightingale"*, *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 1979 Proceedings: 94-105.

[2] Lorinda B. Cohoon, "A Highly Satisfactory Chinaman": *Orientalism Girlhood in Louisa May Alcott's Eight Cousins*, *Children's Literature*, Volume 36, 2008: 49-71.

[3] Shih-Wen Chen,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 in British Children's Fiction, 1851-1911*,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13.

[4] Judith V. Jechner, *The Image of the Child in Chinese Folktales*, *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 1991 Proceedings: 174-180.

[5] Dr Laino Ho,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 then and now*, *New Review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Librarianship*, 01 Jul 2009: 127-137.

[6] Yu Chai Fang, Wang Lin, "A Hard Night", *a 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y by Yu Chai Fang*, *Children's Literature*, Volume 21, 1993: 135-140.

[7] Qi Tongwei,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after 1980*, *Bookbird: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Literature*, Volume 53, 2015(4): 62-65.

播》(*Mulan's Legend and Legacy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1]既溯源了前现代化中国的“女英雄”、“女战士”的流变,儒教文化中的女性价值评价,“白虎星”传说所折射的民间文化;也分析了美国多种图画书中的花木兰形象的多样性,随着迪斯尼动画片《花木兰》的热映,木兰性格与命运的“国际化”嬗变等问题。上述研究均为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学者在美国儿童文学研究的专业期刊、出版社发表的论文和专著,可见学者的文化身份、研究对象、研究方式、学术交流的多元化。

结 语

纵观五十年来美国的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其学科体系和学术立场、研究范式和研究对象都有了极大的变化。其潜在的问题是:一方面,美国对中国儿童文学的阐释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反观其相关领域的现状。这一学术路数、思维模式仍存在于美国儿童文学研究场域的集体无意识中,影响到了美国对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精准性。因此,以批判和分析的态度理性对待美国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厘清“哪些是‘意识形态’的内容,哪些是‘客观知识’,二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2],对于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中国儿童文学的当代变革,既无法完全追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也无法照搬西方儿童文学的现代化模式。这既呈现出这一研究领域的特殊性,也预示了不同思想、理论、方法、观念的介入,可为专业研究开拓出新的空间,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学科发展与对话交流。在互为“他者”所带来的批评与对话中,在检讨各自“区域中心主义”倾向中,在不断建制与修改中,探索其合法性与表述体系,扩容、深化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新起点,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价值重建的必然性学术诉求。

〔责任编辑:平 啸〕

A Review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Yao Suping

Abstract: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began in 1970s, witnessing transformations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and the academic position, as well as identity shifts of researchers, and it also brought about the migration of research targets and research paradigms. The research focus on all-round analysis of Chinese modern children's literature history,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ic culture, the subjec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diversification of academic exchang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US. We are supposed to take analytical and critical attitude towards American researches on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to broaden and deepen the realm of Chinese literature study, from an interactive point of view.

Keyword: America; Contemporary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 stud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1] Lan Dong, *Mulan's Legend and Legacy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 张西平:《汉学研究导论》,〔北京〕《国际汉学》第12辑,2005年第1期。